

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P.1210-220.

第五章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历史传统与西方文化对俄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文化传统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一份无法拒绝的历史遗产,而且这份遗产注定要在该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现代化道路中发挥其影响力。俄国是一个拥有三百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俄国文化传统持续性发挥着它的滞后作用,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且使承袭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和文化传统的俄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俄国著名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认为俄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①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俄国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西方文化的浸润。来自于西方的历史传统和先进思想,同样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对俄国现代化道路也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影响。

第一节 俄国政治传统的形成及其影响

一、俄国政治传统的形成

对于文化与传统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学界早有定论,笔者不在此赘述。但需要做出解释的是,笔者提出政治文化传统概念的意义何在?其内容又如何界定?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是推动任何一个社会和民族发展最活跃的动因。同时历史也将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运动做出如实的记载,因此旧的、长期运行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遗存便构成民族文化传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谈到文化传统内部结构的划分时,我们把其划分为政治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等部分。那么政治文化传统的构成又包括那些内容呢?它至少应该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政治心理三部分内容。政治制度即一个国家或民族经常采用的政权统治形式,社会意识形态即受该政治制度制约的,与其统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思想,民族政治心理即在该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长期侵蚀影响下,在人们思想中积淀而成、因袭相传的政治倾向。

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久远的文化渊源。俄罗斯民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起源于欧洲腹地的内陆森林地带,尽管俄罗斯先民们终于走出了与世隔绝的大森林,但是长期形成的封闭意识却留在思想里。因此在古代俄罗斯人那里,村社(Мир)即世界(Мир)。9世纪瓦拉吉亚人的入侵把宗法制又强加于俄罗斯,再加上蒙古的八思哈制在俄国的强制推行,使村社制、宗法制、八思哈制三位一体汇流成俄罗斯文化的原始基质,即村社——宗法文化。该文化基质反映在民族的价值观念上表现为轻视自由个性,强调整体和谐,反映在政治倾向上表现为盲目崇拜强权,极端鄙视民主。

如果说具有东方特色的村社——宗法文化基质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的话,那么拜占庭文化就这个母体在其孕育时期被强行注入的重要的外来基因。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通过与拜占庭皇室的联姻,接受了基督教的希腊正教,强迫全体国民众皈依耶稣,于是为自己的统治找到了一个现成的统治工具,同时也接受了拜占庭的政治制度。因此,俄罗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集合体,而封闭的村社——宗法文化基质和拜占庭的集权专制制度为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基础。

俄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封建等级代表君主制时期,即由“领主杜马”和大公共掌大权。但是在该时期俄国君主(大公)的权力就显示出较大的独立性,莫斯科大公

^①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2

在法律典籍上是“统治全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的权力“超出世界所有的君主，也支配一切人的生命和财产，而丝毫不受阻碍。”^① 伴随着俄罗斯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和统一国家的最后形成，莫斯科大公也从“同等人中的第一位”变成了俄罗斯惟一的君主，领主杜马和世袭贵族（Боярин）的势力却在日趋下降。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1547—1584年），莫斯科大公由东正教会正式加冕为“沙皇”，并且由东正教大主教马卡里宣布“英明沙皇的权力来自上帝，他的权威至高无上。”^② 伊凡四世在登基后也郑重宣布：“君主的称号就意味着承认不受任何限制的沙皇政权。一切民众，包括世袭贵族在内都是朕的臣民”^③，“朕朝乃圣弗拉基米尔所创，朕生于皇家，长于朝中，掌握自家天下，并非窃自他人，罗斯君主自古以来皆亲临朝政，贵族大臣不得干预。”^④

到了彼得一世统治时期（1682—1725年），俄国的政治制度终于完成了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的过渡。他大力推行一系列旨在加强沙皇专制统治的改革，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军权、神权、司法权集于一身，形成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集权统治局面。他宣布说：“沙皇是专制君主，关于他自己的一切事情，不向世上任何人负责，但作为基督教的国王，他有力量和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⑤ 彼得一世的宣言标志着绝对专制君主制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俄国的最终确立。伴随着农奴制度的发展，专制统治结构更加稳固和完善。当18世纪下半期的西欧和北美一片“自由”“民主”的欢呼声时，俄国却正是“农奴主的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的专制制度的黄金时代。这位被称为是“北方的塞美拉米达”的专制女皇在“开明专制”的口号下行使独裁专制的勾当，把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统治推向巅峰状态。

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俄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是伴随着专制制度的确立而发展。基督教（东正教）传入俄国之后，便立即拜倒在皇权之下，成为其忠实的附庸。东正教会利用它所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极力宣扬“君权神授”，宣扬是上帝把“沙皇安排在他的地位上的，使他坐上沙皇宝座的，并且扶植他统治和管理教会、寺院以及整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和全部俄罗斯土地”。^⑥ 东正教会还积极从理论方面为皇权的加强制造理论根据，东正教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洛费曾臆造出所谓三个罗马的理论，即全世界的历史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罗马（古罗马帝国）早已没落，因为它亵渎神教；第二罗马（拜占庭帝国）也已灭亡，因为它与天主教会同流合污，因而受到上帝国的惩罚；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将是未来正教的中心，莫斯科大公就是正教世界的领袖，“一切信仰基督教正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沙皇统一的王国中去，您（伊凡三世）就是整个世界唯一的沙皇。”^⑦ 长期以来东正教会正是忠实地充当着专制制度卫道士的角色，以愚昧、落后的思想桎梏俄国人民，成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⑧

御用的封建思想家则更多地以理论研究和思想探讨方式论证专制制度在俄国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性，大肆宣扬君权至上、皇权神圣。彼得一世时期的贵族思想家弗·普罗科波维奇依据自然法原理，证明专制君主制最适合俄国的国情民风。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由于缺少最高权力统治，就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不宁，人们的生活和幸福就难以得到根本保障。而人们只有把统治权力交给最高统治者，在世袭的专制君主政体的庇护下，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平稳而有序地发展。因此俄国需要专制君主，沙皇的权力应该是无限的，“甚至不受他自己颁布的法律的限制，对专制君主的命令应该无条件地加以执行，他是最高裁判者，在国家里不

^① 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学书籍出版局中文版.1955.261

^② 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7

^③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28

^④ 施潘诺夫.俄国哲学史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57.91

^⑤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126

^⑥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135

^⑦ 加耶夫.16世纪莫斯科政府的政治活动中的“莫斯科为第三罗马”说历史论丛·第17卷.莫斯科:1952.12

能有任何其他权力可以变更君主的命令。”^②同时代的政治学家塔季切夫也依据自然法原则对自由与专制进行了分析，他承认人的自然状况是自由的，但是自由一旦被普通人掌握就不可避免地要蜕化成个人的任性。因此社会的利益要求限制自由，应该给自由套上一副“缰绳”，最好的方式就是采取强制的君主专制统治形式。他声称：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但是人民经常选择最符合人性的专制君主制作为政权的形式，君主即成为一家之长，而“家长的自然利益，要求在家庭中保持良好的秩序”^③，告诫人们应该绝对服从家长(君主)的领导，从而为沙皇的专制统治涂上一层合乎伦理关系的光彩。18世纪初的思想家伊·波索什科夫的思想反映了新兴的商业资产者阶层拥护专制制度的政治态度和希望依靠皇权的加强来提高该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愿望。他在《贫富论》中主张“沙皇应该是专制统治者，他的命令就应当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象上帝统治全世界那样，沙皇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统治。”^④这些贵族思想家的政治学说直接为彼得一世实行政治改革，剪除世袭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可见，伴随着专制君主政权的发展，以专制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日趋完善。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载体的民族政治心理，必然被打上专制主义的烙印。专制制度在政治上的统治和封建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侵蚀，最终在广大俄罗斯人那里形成了被动的适应和认同，专制主义和皇权主义就成为俄罗斯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普遍地存在着倡服专制，鄙视民主，盲崇皇权，却步自由的倾向。因此，俄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无不带有皇权主义的色彩。17世纪70年代的斯捷潘·拉辛起义的口号是“打倒所有王公、世袭贵族和一切俄罗斯贵族，根除一切长官、政治，并实行人人平等”。但同时又提出“一切东正教徒和所有的教徒们要保护皇室，把处于世袭贵族手中不自由的沙皇解放出来”^⑤的口号，即在反封建的主张之外，又打出了“勤王”的旗帜。18世纪初的农民起义领袖布拉文热情地呼唤农民起来同“世袭贵族、王公以及一切图利者”做坚决的斗争，但也不可避免地要求人们“保卫我们善良正直的好沙皇”^⑥。因此苏联历史学家马夫罗金认为：“拥护好沙皇，这是俄国农民战争的一个传统口号”^⑦，它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变种——皇权主义思想在广大的俄罗斯农民心理意识中的根深蒂固。就连俄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专制制度的死敌——赫尔岑也曾经承认自己在儿时是“在对亚历山大(一世)沙皇怀着极大的敬意的环境中长大的。”^⑧19世纪俄国一些大学里通用的数学教程中也荒唐地规定：“直角三角形的弦是真理与和睦、法制与仁爱相遇的象征，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把天堂同尘世、天上与地下相联结。”^⑨20世纪初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贵族自由派代表人物谢·尤·维特伯爵也自认“如果根据我的家庭传统，根据我的心灵气质，我当然是珍爱权力无限的独裁专制的”^⑩。由此可见，在俄罗斯民族的政治心理上专制主义思想意识植根之深、积淀之厚。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思想中，沙皇总是好人，因为他热爱人民；沙皇的专制权力乃上帝所授，所以神圣不可侵犯，需要绝对服从。

二、俄国政治传统与现代化的对抗

因此，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和与其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政治心理构成了社会经济基

^① 杰里扬诺夫.同 1905—1907年革命做斗争的东正教会.莫斯科:1984.212

^②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195

^③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197

^④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199

^⑤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202

^⑥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203

^⑦ 马夫罗金.普加乔夫和他的战友.莫斯科:1965.2

^⑧ 赫尔岑.往事与回忆.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63

^⑨ 涅奇金娜.十二月党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2

^⑩ 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45

础深厚的封建政治文化传统，它日益广泛地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广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形成深层的遗存，然后再以民族心态、社会心理、价值标准和政治倾向等无形的映体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在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仅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而且对新思想的传播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因此在19世纪以前的俄国思想文化领域，正统的专制主义思想成为游荡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幽灵。

但是历史的发展终究不可阻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终将踏上现代化的道路，而新思想的兴起同样终将冲破旧的思想体系的层层网罗。十二月党领袖彼斯特尔感受到：“1812年、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发生的事件，与这几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一样，让人们见识了朝代的不断更替：多少宝座被推翻，又多少帝王被扶起来；多少王国被消灭，又多少新的国家被建立起来；多少沙皇被废黜，又多少人复辟称帝；完成了多少次革命，产生了多少次政变——所有这一切使智者认识了革命，了解了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并且不同的世纪有其不同的特点。现今世纪的特点就是人心思革命。在欧洲各个角落，从葡萄牙到俄国，无一例外，甚至象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也到处都是同一的景象。整个美洲亦复如是。改革的精神，可以说，使各国思想家感到激奋。我认为，这就是产生革命思想、革命法规，并使它们牢牢扎根于智者头脑中的原因。”^①19世纪20年代在俄国的思想文化领域终于掀起了思想解放的狂飙，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为主体的先进思想向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发起了挑战。俄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们为俄国政治现代化的实施做了必要的思想启蒙工作。

来自封建贵族阶级的一批先进青年最先成为民主思想的信徒和专制主义的叛逆者，他们是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继承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命家的斗争精神，并且在思想和理论上前进了一大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是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祸害，应该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消灭它。他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真地考察了俄国历史和当今世界政治的发展，科学地指出：“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向行将来临的社会主义的过渡，同样都必须通过革命的途径，革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②杜波罗留波夫称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社会，是一个被痛苦折磨着的社会，是一个监狱般死气沉沉的社会。在这里，只有听到低徊无力、一现即逝的窃窃絮语才偶然显露一点生气。毫无光明，毫无温暖，毫无自由；黑暗保护的监牢，散发着霉烂潮湿的臭气。世上的一点声音，晴天的一丝光芒，都无法授进这座监狱里去……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正在那里受苦；从这些已经变野的、沉默不语的、肮脏的生物身上还可以认出人的面目，然而我们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和恐惧。”他看到“昔日占统治地位的地主对于农民特别是对农奴的独断专横，是完全以地主脾气是否暴躁为转移的。这种独断专横，是由于地主当时所处地位而产生的普遍的必然的后果。”^③他宣布：“专制制度和旧的传统是民族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是与受其压迫的人民为敌的”。因为在这个黑暗王国里，“人类尊严、个性自由、对爱情和幸福的信念，纯洁的正直劳动都被那些胡作非为者践踏得一点影子也没有了。”^④他号召人民去推翻现存制度“这栋腐朽的大厦”。别林斯基在给《果戈里的一封信》中也描写俄罗斯“现在是一派可怕的情景，在这个国度里，有人贩卖人的勾当，他们这样做，连美国农场主所狡猾地利用的那种口实（一口咬定黑人不是人）的行为也没有；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称呼自己不是用堂堂正正的名字，而是用阿猫阿狗的浑号：万卡、斯捷什卡、瓦西卡、帕拉什卡；在这个国家里不仅对人身、荣誉、财产没有丝毫保障，而且甚至连警察制度也没有，有的只是挂了各

^① 涅奇金娜.十二月党人.18

^②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397

^③ 布尔拉茨基.杜波罗留波夫的政治观点.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98—99

种公职的窃贼和强盗的庞大集团。”^②正是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作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体验者和超越者，以他们无情的笔触剖析了专制主义文化的腐朽和黑暗，呼唤民主和自由，规划人类美好的理想，因此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建者。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推动了俄国几代人在愚昧中猛醒，在困惑中振奋，投身到史无前例的现代化洪流之中去。

但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是经历漫长的历史孕育和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并且将持续地对该民族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影响作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文化传统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糟粕和消极成分必然成为现代化运动的巨大阻碍。在俄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充满着旧的文化传统与新的文化因素的激烈撞击，充满着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殊死搏杀。

早在19世纪初，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统治危机已现端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初入俄国的时候，一些反动的贵族思想家和政治家便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以正统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自居，挥动专制主义大棒，大举讨伐一切进步思想。俄国著名的贵族历史学家尼·米·卡拉姆津伯爵在他的《关于古代和现代俄罗斯的札记》一书中恶毒咒骂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的灾难”，他宣布谁反对专制制度和违反俄罗斯人世代相承的传统，谁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叛逆”。他在考察了俄国自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一世的政治发展历史之后，宣称“专制制度是圣物，是俄国繁荣昌盛的保护者。”俄罗斯人应该做的事就是毫无怨言地服从，保持对君主的绝对信任，“即使坐上王位的是一个暴君，臣民也必须服从，而把他的暴行当作上帝的惩罚来承受。”^③这本书是19世纪俄国贵族农奴主阶级顽固维护专制体制、反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宣言，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统治阶级一片赞扬。19世纪30年代在俄国思想文化界颇为活跃的“斯拉夫派”则强调俄罗斯的民族文化传统与英、法不同，“俄国历史发展得最早，而且将沿着完全独特的道路发展，在专制制度救星般的领导下，不会发生革命。”^④30年代的反动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不仅下令严格禁止在大学、中学中宣传一切有悖于专制制度的思想，而且还亲自炮制出所谓官方民族性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是俄罗斯文化和国民生活的基础，必须发扬光大和严格遵守。

同时即使是最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意识中也同样充满新、旧文化思想的撞击。赫尔岑、杜波罗留波夫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科学地预见资本主义必将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但是他们在规划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囿于对俄国文化传统的留恋，都试图把先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嫁接在俄国的原始村社文化的基础之上。认为依靠“按其天性和传统来说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农民的革命，利用俄国的古老社社就可以绕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陷入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沼。造成这种思想偏差和理论失误的最根本原因，正是深藏在这一代革命家心灵深处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质仍然是旧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意识的对抗，表明俄国最先进的人士仍然难以摆脱传统意识怪圈的困扰。

19世纪70年代，一大批先进青年响应“到民间去”的口号，来到俄国偏远的乡村，以高度热情和牺牲精神，向“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广大农民宣传民主思想，发动农民起义，以实现赫尔岑、杜波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民社会主义”理论。然而他们在现实面前困惑了，因为农民对推翻专制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采取完全不理解和敌视态度。“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同样证明了文化传统与现代思想的对抗。

第二节 俄国经济传统的形成及其影响

一、俄国经济传统的形成

^①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402

^② 波古萨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4

^③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360

“文化”一词的原始词意是指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农业耕作，无论是英语中的“文化”(culture)，还是俄语中的“文化”(культура)，词源都是“耕耘”或“栽培”。因此研究俄罗斯文化传统，必须研究其经济文化传统。经济文化传统的概念即是把人类所经历的经济制度，采用的生产方式和传承的经济心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传统予以研究。它包括两层含意：长期运行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受该经济制度制约并适应其社会需要的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和经济价值观念。

农奴制是在俄国经济生活中保持 370 余年绝对统治的经济制度，是俄国经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农业耕作是俄罗斯先民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早在公元 10 世纪俄罗斯的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建立之前，俄罗斯人便已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开始封建化过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农奴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伊凡三世完成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封建地主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农奴制生产关系开始在全国确立。1497 年法典限制农民的自由流动和依附关系的转换，农民只有在每年的尤里耶夫节(俄历 11 月 26 日)前后一星期内，才允许迁徙他乡，寻找工作。从而通过法律形式把 10 世纪以来封建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农奴制关系在全国确立下来。16 世纪初，一个完整的农奴制经济体系和隶属关系在俄国已经形成。农民被分为领主农奴、宫廷农奴、国有农奴、寺院农奴。16 世纪 80 年代，政府又相继颁布了“禁年令”，宣布废除尤里耶夫节前后农民可自由迁徙的规定，农民最后一点合法权利也被彻底剥夺。1649 年法典中再次规定农奴主对农民有无限期的占有权。农民连同其家庭及财产都属农奴主，从而把农民世代都束缚在土地上。因此“1649 年法典是农奴制胜利道路上的重大里程碑”，^②它标志农奴制在全国统治的稳固。从 1497 年法典到 1649 年法典，以超经济强制为特征的农奴制经济终于在俄国完全确立。从 16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期，农奴制在俄国始终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农奴制经济就其实质来说就是集权专制主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体现，是一种野蛮落后的经济体制。在隶属关系上，农奴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依附于农奴主，农奴主可随意用农奴抵押、转让、流放以致杀戮。即“一方是无限专横，另一方是毫无权利”。^③在生产方式上，实行密集型的超经济强制劳动，绝少采用先进技术。因此列宁认为：“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④农奴制是专制制度统治最稳固的经济基础，专制制度则是农奴制存在的政治保障。17 世纪中叶，农奴制的最终确立，为俄国政治制度的转换，即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过渡奠定了经济前提。到 18 世纪初，俄国专制制度最终确定，为农奴制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证，使农奴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8 世纪下半期，当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之时，俄国却正值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黄金时代。

一种封建制度的建立，便有封建意识形态的认同。农奴制的发展不仅需要专制制度政治上的保障，而且还需要封建思想在理论上的认同。19 世纪初的贵族历史学家包果丁主张：俄国历史进程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自由未必适合于俄罗斯民族，“好的农奴主会比农民自己能更好维护农民利益。”^⑤在前面我们提到，到 19 世纪 30 年代贵族思想家、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了官方国民性原则，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是俄罗斯的国民性原则，他宣称：“专制制度与农奴制是两种平行的势力，二者必须同时发展”，因此“不发生普遍震荡，即不

^①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370

^② 诺索夫主编.苏联简史.第 1 册,上卷:北京:三联书店.1976.200

^③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402

^④ 列宁全集.第 3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4

^⑤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370

能触动农奴制度。”^① 贵族思想家的主张为农奴制的发展在理论上赋予合理性，以知识教化的形式侵蚀了一代代俄罗斯人。尽管 19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大潮，但俄国的农奴制仍顽固地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到 19 世纪 60 年代才废除，并且在农奴制改革后，农奴制的残余仍浓聚不散，长期地阻碍着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二、俄国农民群体经济价值观念的特点

农民和地主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群体，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该群体的经济活动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在农奴制统治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异化，导致农民劳动态度的扭曲、劳动目的的相悖、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原始社会里，俄罗斯农民受益于村社和土地，村社是互助和谐的集体，土地是养育农民的母亲。然而当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取代了田园诗般的原始社会后，农民对劳动、对土地态度发生了巨变。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主的依附品，原来曾经给予农民幸福和希望的土地变成了禁锢他们的牢笼，一年的辛勤劳作之所得几乎全部交予农奴主。于是农民发现来自身所固有的素质和力量已变成与自己对立并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农民“只是物，是耕地的工具”^②，农民经济行为出现了异化。在人身不自由、精神受压抑、生活乏饱暖、未来无希望的情况下，农民厌恶劳动，因为劳动不再是幸福的源泉；农民憎恨土地，因为土地是地主的财产。农民的劳动态度变得消极被动，对生产和收成漠不关心。18、19 世纪的地主申诉书中经济有这样的抱怨，称农民的劳动是“懒散、迟钝和毫无兴趣的”，“农民荒废领地、践踏庄稼、毒死牲畜，想方设法破坏主人的田产。”^③ 俄国的农业收获量与种子比例经常是 3.5:1，单位面积产量 10 年、甚至上百年也无明显增长^④。几百年来广大俄罗斯农民就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在这种矛盾心理背景下被迫从事经济活动。

价值观念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取向，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俄国封建的农民群体(包括从事农业经营的地主)对经济事物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估是在其直观封闭型思维方式下进行的。

该群体经济价值观念特点之一是其财产观念的狭隘性。仅从消费和自然的角度看待财富，把财产和金钱当做养家糊口的必要的生产资料，认为利用它发财致富是不道德的。即“财富没有独立价值，也不是他们的生活目的，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世界观，只有贫穷才能保证阴间得救”。另外农民群体“总是认为，资本不如土地稳定，虽然它对人相当诱惑力，但比土地更易失掉。”^⑤ 大多数地主也把巧取豪夺来的金钱仅仅看成是生活资料，忙于用其进行淫逸享乐，疏于用其进行扩大再生产，更绝少将金钱投入流通领域开矿办厂。

特点之二即农民群体观念的封闭保守性。农民长期厮守于土地和村社，村民的生活完全是建立在世代沿袭的民族传统基础之上，封闭守旧的生产方式更促成了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他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习惯于把旧的体制、旧的模式、旧的章法、旧的生活方式和先人圣典作为标准，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持怀疑态度。

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问题曾论述：“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范围，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各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害怕竞争就象怕火一样，他们这种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惊扰的。”^⑥

特点之三即是俄国农民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村社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组织，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是维持村社内部秩序的公认原则，也是村社成员共同遵守的良好美德。

^①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 2 卷,第 1 分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208

^②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377

^③ 斯米尔诺夫等.17、18 世纪的俄国农民战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3

^④ 徐景学.俄国史稿.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243

^⑤ 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4.18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5

尽管后来阶级压迫取代了平等互助，私有制取代了原始公有制，然而村社精神和原则却保存下来。恩格斯曾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村社保留至今的欧洲唯一国家。”^①俄国农民大多数人仍把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奉为神明，把这种思想升华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最终在政治上，专制主义取代民主主义；在社会关系里，集体统一意志取代个人独立性，个人创造力和奋斗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总之，俄罗斯农民群体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念根植于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土壤之上，负承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世代相袭，日臻深厚。

三、俄国经济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

现代化是一场历史性变革，它将毫无例外地波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俄国在落后于西欧近一个世纪后，终于艰难地迈开了现代化的步伐。

俄国经济现代化包括了整个封建经济体系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变。即在经济体制上，由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体制的过渡；在经济结构上，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在经济形态上，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可以想象在俄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现代化起步迟缓的国家里，其现代化任务的艰巨。在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必然充满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生产关系的激烈冲突，而深存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封建经济传统也必然要持续地发挥其滞后影响。

农奴制的残余成为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阻碍。农奴制在俄国维持了长期统治，其影响力涉及国民生活各个方面，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广泛的适应。农奴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可以通过法律予以废除，而它作为一种传统，却难以在短时期内根除其影响。改革破坏了劳役制的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雇佣制过渡，然而劳役制的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消灭，劳役制的残余——工役制仍顽固地排斥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工役制下，农民仍要用自己的工具为地主耕种，收成大部分仍需交给地方以及承担繁重的赋税徭役。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农奴制的超经济强制依然存在。工役制成为徭役制的再版，因而它自然地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阻碍。

1861年颁布的《赎地法》规定，农民在未交清份地赎金前，不得离开村社，无权自由流动。于是刚刚从农奴主奴役下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被套上了村社宗法制的绳索。农民迫于工役制和村社制度的束缚，不能自由迁居、择业，也就不能为资本主义工业和农业提供急需的雇佣劳动力。俄国财政部1880年的报告中承认：“所有直接税和负担都和从前一样落在农民身上，阻碍他们的福利和事业的正常发展。”^②同时，农奴制残余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也自然要渗透到资本主义工业中，如许多私人企业家仍继续沿用封建超经济强制式的管理生产方式。苏联学者基塔尼娜认为：“俄国垄断资本上层分子发财致富的基础，不仅仅是垄断利润，而且在较大程度上靠着封建的剥削方式。”^③农奴制的残余影响深远，最终使俄国的农业经济走上了“普鲁士式”的缓慢发展道路。

国家超常干预的经济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和长远发展。在俄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合二为一，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系统不仅控制着国家的政治事务，而且还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国家的其他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事务实行超常干预，最终经济政治一体化，成为俄国一大传统。这种国家干预经济的机制，在某些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超常干预根本违背了经济独立发展的固有规律，妨碍了经济结构的自行调适和经济发展的自创能力。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起步较晚，资金积累、市场销售及竞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在俄国工业化初期，国家干预机制仍起到重要作用，沙皇政府推行了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20

^②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157

^③ 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81,(5).62

如大量引进外资、扩大铁路建设、提高关税利率、增加官方订货等。1892年的关税改革使资产阶级受益非浅，莫斯科工商业界领袖莫罗佐夫曾满怀感激地表示：“君主的恩惠在提高20%的关税中升高了。”^①政府干预经济和扶植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造成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经济依赖，导致私营经济官方化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萎缩，同时也妨碍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致使其政治主张一贯保守。摆脱对沙皇政府的依赖，使私营经济独立发展，曾经被视为一些“天真的”经济学家的幻想。1903年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报刊上曾向企业家们建议，放眼于有潜力的国内市场，主张：“农民的小屋是最好的市场”^②，但立即遭到企业家们的反对，“梦想将我们的冶金业生产束缚在马掌、铁车轴和马口铁的需求上，这完全不是面对现实的人的想法。”^③什么是俄国的现实呢？用俄国企业家们的话表述即是“在俄国居民极狭小的需求方式下，官方是产品最主要的需要者，所有的工业部门都要采取措施取得官方的援助和在具备官方定货的条件下生产。”^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工商界立即号召工商企业家们“必须一秒钟都不要耽误地地动员全部工业，必须使一切生产都适应战争的需要”^⑤，以响应沙皇政府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要求。这一切都表明长期的依赖关系，已使俄国资产阶级自然地把企业的前途与专制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封建文化传统的表现，其结果必然为俄国的经济现代化设置难以克服的重重障碍，阻碍其正常健康发展。

传统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成为阻碍俄国现代化进程的潜在因素。经济体制的变革相应地要求价值观念和经济思想的更新，商品经济呼唤创新开拓观念，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断改进技术和改革管理手段，提高经济效益。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开放系统，任何一个有活力的系统，都必须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和信息。然而在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基础上积淀而成的封闭因循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及其行为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却难以彻底根除，不断地与商品经济思想发生激烈冲突。具体表现在：农民群体基于传统观念对新生事物采取冷漠的态度，以至心理抵抗。农奴制改革前，政府为发展农业和开拓工业品市场，曾广泛地鼓励使用较先进的农机技术。然而大多数地主表示反对，莫斯科省大地主别列章尼表示：“如果用了打谷机那个玩意，把庄稼在秋天里打完，那么农民和他们的老婆在冬天里干什么呢？打谷机要花钱，要修理，还要为它养马，而农民的劳动却可以不费一文钱。”^⑥在这里，传统经营思想与现代经营思想发生了冲突。农奴制改革后，各种信贷合作社出现，但资本主义信贷制度的推广却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因为农民的自然财产观念对近代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产生了抵抗作用。农民认为信贷合作社既然为村社所建，那么它所支配的钱就应该平均分配给大家无偿使用。他们对于借贷必须付息更是难以理解，他们抱怨“15年前我在那里借了100卢布，每年付的利息早已超过借款数了，而他们还总是认为我欠他们100卢布。”^⑦许多贵族地主出身的企业家仍固守于封建的土地观念，在经营工业企业的同时，还要花费很大精力去管理乡下的土地和庄园，如普梯洛夫——斯塔赫耶夫——巴托林康采恩的一位组织者斯塔赫耶夫就是一身三任的人物：企业家、经纪人和地主。俄国早期的工人阶级绝大多数来自农村，“长期以来，他们把一只脚留在他们的村子里”^⑧，他们虽已进城做工，但仍然习惯于用农民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俄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弗列罗夫斯基在亲自考察了帝俄工业省份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后认为：“尽管工人的天生才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其一生总的表现中，最经常的是着眼于追求自己需要的短暂满足，没有任何

^①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270

^② 切尔明斯基.帝国主义时期苏联史.莫斯科:1974.P21.

^③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2卷:393.

^④ 里弗申.俄国经济中的垄断.莫斯科:1961.367

^⑤ 里弗申.俄国经济中的垄断. 81.

^⑥ 历史译丛.1957,(1).P64.

^⑦ 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P22.

打算未来或抱有偏见的思想。”^②因此封建文化传统同样是俄国最先进阶级成长过程中的异己因素，是阻碍现代化的不利因素。

第三节 西方文化对俄国现代化道路的影响

一、西方文化的历史影响

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到近代发展成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后来又形成了无产阶级的经典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近代乃至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该文化对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进步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尤为明显，它为专制黑暗的俄国带来了启蒙的曙光，以先进的思想启迪一代代革命者，同时也警视了专制统治者，从而推动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

俄国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有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为公元10世纪末，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统治时期将基督教（希腊正教）传入俄国；第二次高潮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依照西方的经济、文化模式进行的大规模改革；第三次高潮是19世纪20—70年代，即十二月党人等贵族革命家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及实践；第四次高潮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把该理论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公元10世纪末基督教传入俄国，首开俄国引进西方文化之先河，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的统一，加速了俄国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是作为一种现成的统治工具传入俄国的。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宗教是人类文明的必经阶段，是人类文化的内容及物质精神生活的折射与反映。尽管它是对社会现实和人们心理的歪曲的反映，但是它对早期人类和初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及历史传统诸方面的发展。宗教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与世俗权力相抗衡的教权统治方式，如基督教会曾在欧洲曾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发起数次十字军东征并且纵横于欧洲各国王权之间；一种是世俗权力把神权置于其控制其下，成为君主王权统治的理论工具。弗拉基米尔将基督教引入，目的即在于后者。

长期以来，东斯拉夫人一直信奉多神教，崇拜祖先，迷信万物有灵。这种信仰混乱，教出多门的局面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王权统治。因此，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决定寻找一个外来的宗教以统一斯拉夫人狂热崇拜的多神教，以便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使他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上帝所派的庇护者。”^③

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的联姻，首先皈依了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而后诏令全国，将基督教定为基辅罗斯的国教，强迫市民去第聂伯河里接受洗礼。基督教会（东正教会）一入俄国，几乎立即被置于王权控制之下，它在俄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教会利用它所控制的文化教育机构，宣扬大公（后是沙皇）是上帝的使者，是上帝把大公（沙皇）“安排在他的地位上的，使他坐上沙皇的宝座……并且扶植他统治和管理教会、寺院以及整个信奉东正教国家和全部俄罗斯土地。”^④

彼得一世仿效西方的改革，使俄国社会和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印迹，为俄国现代化的实施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17世纪末的俄国是一个极其落后，长期与欧洲文化中心隔绝并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的国家。由于战乱频繁和灾荒连年，以及野蛮的农奴制的束缚，使俄国的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国家统治方面，国家大权并未完全归于皇权一尊，皇权还处处受到世袭贵族特权和教权的掣肘，中央集权机构不甚健全，传统的衙门制度

^① 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207.

^② 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539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5

流弊严重。俄国的文化教育也非常落后，全国识字的人数甚少，象莫斯科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其市民的识字率仅为 23%。^②教会把持思想、文化、艺术领域，阻碍一切先进思想和科学的传播，东正教会宣布：“上帝憎恨任何热爱几何的人，它是一种精神上的罪恶。”^③因此，这种落后的状况严重地阻碍了俄国社会的发展和俄罗斯民族的进步。俄国统治阶级内部以沙皇彼得一世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清醒地体察到俄国落后的状况，“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④毅然抛弃俄罗斯守旧自大、闭塞因循的传统，仿效西方先进的经济、文化制度，实施自上而下的重大变革。

彼得一世自称是“寻师问道的小学生”，率俄国使团亲赴西欧，考察了那里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回国后倡导和主持了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改革。在政治方面，加强皇权的专制权力和中央集权制，整肃吏政；在经济方面，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场制度，改良农业，发展商业；在军事方面，从无到有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队。彼得一世在社会文化方面实施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其社会影响也最为深远。他试图使俄罗斯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文明开化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他首先把俄罗斯人的胡须看作是俄罗斯落后的象征，明令禁止蓄须，甚至亲自动手为宫廷显贵们剃除胡须，明令禁止穿俄式长袍，改穿西式短装，倡导欧洲宫廷礼仪和社会风范。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清除俄罗斯人的愚昧，主持创办俄国历史上第一所世俗学校，第一座图书馆，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份报纸，第一座公共剧院和第一个印刷所。他简化俄文字母，改革俄国历法，把西方近代科学著作介绍到俄国。他亲自主持编写《北方战争史》，签发了第一道关于建立帝国科学院的诏令。社会风气的变化带动了全面的改革。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西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认为：“他并不是赤手空拳地把俄罗斯转化为一个西方国家，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且使这一过程朝更强烈的方面发展。”^⑤

彼得一世改革的最可贵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通过改革打破了俄罗斯人长期形成的闭塞守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为因袭封闭的俄罗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成分，使其深深地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自此俄罗斯文化便呈现出开放的特征，从而为俄国现代化的启动创立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彼得一世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在历史发展趋势前，能够冷静思考，毅然决断，冲破一切阻力，大胆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这种开放的心理实为难能可贵。而且，他这一品格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的后继者——叶卡特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等统治者。

但是彼得一世倡导改革和西化，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他的专制统治，因此改革只能是保守的改革，西化只能是有选择地西化，即他只引进西方文化的表层东西——科学技术、工场制度、教育体制、文化习俗等，而把西方文化的内核精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和共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一概拒之门外，这无疑又为俄国现代化设置了一层无形的障碍。而叶卡特琳娜二世便承袭了他这一统治手段，表面极力推崇法国启蒙思想，倡导所谓“哲学家与君主结合”的开明专制，而实质上仍在实行绝对专制统治。

19 世纪 20—70 年代是俄国思想解放的狂飙突进时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成为俄国思想解放的主题，十二月党人贵族革命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一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

十二月党人在少年时代大多都接触过西方的文化和教育，在学校读书时便开始钻研西方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些著作多半出自伏尔泰、卢梭、马布里等人手笔。而且俄

^①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126

^② 苏联科学院历史所编.苏联史纲.莫斯科:1954.555

^③ 帕尔默.近现代世界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9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2

^⑤ 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第 2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82

国的先进思想家的著作也启发了他们思想，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使十二月党人看到了俄国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黑暗暴虐。1812年战争后，十二月党人远征法国，亲身体会到那里的民主气氛，看到了落后的俄国与先进的西欧的差别，从此公民民主和人民主权的思想战胜了他们头脑中的传统政治观念。如果没有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十二月党人就很难形成超出俄国现实近半个世纪的革命世界观。十二月党领袖彼斯特尔早年曾经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俄国国内政治的现实情况和西方共和民主制的影响促使他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从此“我在心里变成了共和主义者，并且认识到任何统治形式也不会象共和主义统治形式那样，给俄国带来更大的幸福及更大的安乐。”^①他认为：“我从君主立宪思想方式转变为革命的思想方式，最主要的是由于下列论题和见解的影响，——德杜—德—特拉西的法文著作对我发生很强烈的影响。”^②法国1793年宪法和土地纲领成为十二月党人在制定其政治纲领《俄罗斯真理》时仿效的蓝本。在这部光辉的文件中，浸透了法国启蒙思想，它宣布在俄国消灭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及封建等级制度，建立议会和民主共和国，俄罗斯农民充分享有言论、信仰、出版、财产、迁徙等人身自由。然而十二月党人虽然意识到了沙皇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并对“自由”“民主”思想做了热情地宣传，但是他们没有找到革命所依靠的阶级力量，而是单枪匹马地与专制制度搏斗，而最终归于失败。

十二月党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专制黑暗的俄国传播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以自由的鲜血和牺牲唤醒了大批后来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③在1848年欧洲革命的洪流中，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和巴枯宁为代表的新一代革命家成长起来。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欧美的先进思想，研究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傅利叶的思想，研究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更切合俄国社会实际，他们的理论更立足于俄国解放运动。他们认识到“专制制度和旧的传统是民族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④号召人民推翻现存制度“这栋腐朽的大厦”。他们在思想和理论上又比十二月党人前进了一大步，即他们能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指出了“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以及向行将来临的社会主义过渡，同样都必须通过革命的途径，革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性。”^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在主观意识层面上表现为试图坚决抛弃传统，接受新观念，然而在客观意识层面上又表现为对传统的依恋，这种心态在新旧观念撞击、新旧文化转换时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他们在规划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时，总是试图把西方先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嫁接到俄国古老的原始村社文化基础之上，这种结合是对先进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扭曲。他们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当时的俄国社会中，实现社会主义，实现俄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无产阶级尚未形成，而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阶级是不能独立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后来的革命民粹派是俄国现代化的先驱，他们为俄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功绩在于，他们能够冲破封建文化传统的层层束缚，大胆地到西方文化中寻找改造俄国社会的理论，把民主思想作为一面镜子，无情地照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丑陋和黑暗，热情地呼唤着人民革命。但是，尽管这些革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把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俄国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实际的改造俄国的理论，但他们未能制定出科学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创建及其实践的任务便留给下一代革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完成。

^① 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136

^② 孙成木.俄国通史简编.下卷:4

^③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9

^④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402

^⑤ 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卷:402

民粹派运动的失败教育了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就是在批判民粹主义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1880年后，普列汉诺夫流亡欧洲，他不仅在法国、德国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运动的伟大力量，而且更多地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其学说中找到了解决俄国革命问题的钥匙。他欣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仿佛是一条引路线，引导我们走出了矛盾迷宫，我们思想由于受到巴枯宁的影响，而在矛盾中挣扎。由于这个理论的指引，使我们完全懂得了，为什么革命宣传在工人中比在农民中取得的效果要大的多，马克思的理论给了我们一把利剑。”^①1882年，普列汉诺夫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并请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俄文版序言，把这一光辉的著作介绍到俄国。在艰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中，他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民粹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英雄史观和主观社会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列宁在早年也曾为民粹派的救世理论所吸引，但是他很快地发现了这一理论的弱点，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过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欧洲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②在19世纪末，俄国革命中各种思想混杂，不仅有民粹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横加阻挠，而且其他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渣泛起，另外在国际上，以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泛滥，在俄国也出现了修正主义的变种。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为了更广泛宣传革命真理，列宁作为自觉的革命战士，与号称是“人民之友”的自由民粹派、资产阶级“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进行了长期艰巨的论战。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的结晶——列宁主义，创立了俄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在第四次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人扮演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传播和借鉴西方文化都是立足于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诞生意味俄国几代革命者在近一个世纪的苦苦探寻后，终于在西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二、对俄国吸收西方文化的思索

以上我们对西方文化在俄国历史上的引进及其对俄国现代化的影响做了概要的回顾。那么，为什么在俄国历史上能出现数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的现象呢？

首先，从地理因素方面看，俄国虽然为内陆国家，但却身处欧洲中部，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带上，这为西欧先进文明的传入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上弗拉基米尔大公、彼得一世以及后继者一直在为“出海口而战”，最终使俄国成为濒海的国家，使俄国有了眺望西方的窗口，这些因素都有利于西方文化的引进和传播。

其次，从西方文化的借鉴和传播者方面分析，俄国的统治阶级和革命者在内心深处都存在对西方文化的原始认同感。俄国的统治阶级的很多人从小就接受过西方文明的熏陶，在心理上大都依属西方文化，当俄罗斯国家出现危机或他们个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他们便自然地到西方文化中去寻找出路。弗拉基米尔大公引进基督教，在精神上统一俄罗斯；彼得一世学习西方，推行改革；叶卡特琳娜二世接受启蒙思想，倡导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标榜民主，自称为“自由主义者”，都是巧妙地把西方思想、文化变成适应俄国专制统治的理论工具。但也在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的传播。俄罗斯的先进知识分子多接受过正统的西方教育，很多人又都曾长期旅居欧洲，亲身体验了西方文明和民主的气氛，他们怀着对专制制度的无比憎恨，对自由生活的极度渴望，把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作为启

^① 纳尔斯基.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55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

迪民智和反对专制制度及农奴制的有力武器。他们是俄罗斯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俄国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

第三，从俄罗斯文化形成的特点和结构方面看，俄罗斯文化易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俄罗斯文化本身是在融合多民族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是东、西方文化的汇合体，结构多元并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西方文化又曾经是俄罗斯文化的母体之一，因此后者自然对前者拥有内在的亲合力。西方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及融合过程。俄国的先进分子在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在从事另一项伟大的历史性事业，即改造旧文化，建构新文化。

在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重大影响。西方先进文化对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文化是俄国现代化发展的制动器和催化剂。因为传统文化在成为历史发展的阻碍时便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惰力，人们的思想要想从已成定势的旧体制中挣脱出来，即需要来自主体内部的自省自识，更需要来自外界客观的冲击和震荡，西方先进文化在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起到的正是这一作用。